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乡土社会转型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日益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离土”与“留守”的社会事实,给承载农业文化的乡村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传习久远的农耕经验和手工技艺渐已淡出乡民的视野。在这种背景下,寻找开掘乡土文化资源的有效路径,保护和传承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乡土中国”的理解,更能提升我们对自身所属文化模式的认识。

关键词: 乡土社会;乡村文化;农业文化遗产;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09)06-0109-05

中国文化被称为“乡土文化”或“五谷文化”,表明中国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特殊的亲缘关系。美国农业科学家金(F. H. King)曾以土地为基础描述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与“土”的循环。人从土里生,食物取之于土,泄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因此,中国的农业不是与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协和的农业。^①在这种人与“土”的模式中,四季循环不已,庄稼春种秋收,个体生命的血脉也在子子孙孙的扩大和延续中生生不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乡土中国”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而且一直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靠田赋,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要靠农产,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②这种被土地束缚的格局,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松动。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农民的生活来源也更多地依靠农业外收入。在这个深刻变革的时代,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为生产力,并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

一、现代化与农民生活世界的重构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传统农业实践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致使乡村固有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难以成为“诗意地安居”之所。就农业生产本身来说,农业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饲养科学化等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成果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农耕方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村富余劳动力逐年增加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因此,寻找农业之外的就业出路是农民应对生活压力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工业化超前、城市化不足,农业比重下降、就业结构失调的现象严重,从农村流动出来的劳动力难以被有限的城市社会吸收。世界上的工业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是逐年减少的,农民是逐渐减少的,而我国与大规模工业化同步的却是农民越来越多。1958年我国有农民54704万人,1978年农民为79014万

收稿日期:2009-05-20

*基金项目:中国农业大学科研基金延续资助项目《社会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实践与反思》(2007-2009)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孙庆忠,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人类学博士。

人,1998年农民达到94025万人,到了2006年,农业人口达94900万人。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2006年农业份额只占11.7%,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劳动力的42.6%。这也就是说,42.6%的劳动力创造了11.7%的社会增加值,有30.9个百分点的结构差。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农民穷、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③从1989年初首次“民工潮”开始,中国农民便开始了候鸟式的流动。他们之所以向往工业文明,向往没有黑夜的城市,直接原因在于:第一,农业收入低,农民生活困顿。统计数字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还在扩大。2002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3.11:1,2006年为3.28:1。与之相对应,城乡居民消费方面的差距也在逐年扩大。1985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673元,农民为317元,二者差距为1:2.12;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998元,农民为1670元,二者差距为1:2.99;2006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697元,农民为2829元,二者差距为1:3.07。这表明农民的购买力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农村消费水平比城市居民要落后10—15年。^④第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里的学校、银行、邮政、交通、救助、市场等公共设施,都是乡村所短缺的资源。不是农民渴望简朴的生活,而是农民因条件限制只能因陋就简。农民提高收入的窘境、文化生活的匮乏,是他们选择离开的内在动力。此外,无论是我们对乡村社会状况的调查,还是学者们对村落社会的研究都显示,农村人口年龄偏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特性,决定了他们无力改变家庭生活状况的事实。

大部分中青年人离开乡村,直接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这无疑给承载农业文化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农民与土地的部分疏离,也打破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平衡。有学者认为,此时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是留守,叶敬忠等以“别样童年”、“阡陌独舞”和“静寞夕阳”形象地勾勒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生存状态。^⑤而那些有形的农具和无形的农业技术和经验,曾是农民靠土地生活的象征,而今“农民,这个被现代化工具宣判了死刑的阶层,正在等待寿终正寝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土地的魅力已经完全丧失。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现钞。好在儿女们的肌肉并没有随古老的工具消失而消失。儿女们将肌肉能量转移到城市

的水泥上去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老农们显得十分的平静。猪圈、牛栏拆除了。古老的农具变卖给收藏家了,锄头上的泥土已经清洗,高高地挂在了墙壁上。他们一边搓麻将,一边盼望着邮差的到来。”^⑥对乡村而言,走出去才有希望。农民的儿女如果没升学的話就会出去打工,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家庭贫穷的生活状况。与农民如潮般城乡流动的同时,电视、手机等信息媒体也在引领着乡村生活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化正在影响着农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重新设计。当农民不再倾注心力于农田,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日益成为农民向往的生活目标时,农业文化也就只能是夕照残阳了。

二、乡土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农业的永续发展

工业文明的导入使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冲击。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通过使用农家肥、青肥、土地轮种、套种、灌溉、修建梯田等多种方式,基本实现了对土地的永续利用,而在现代社会,土地有了问题就依靠化肥和农药,天气有了问题就用大棚,农民更多的是以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作为劳作的第一选择。随着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的进入,土地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就出现了硬化、板结、地力下降、酸碱度失衡、有毒物质超标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这样言说并非是要拒绝工业文明,但是在和昔日的农业文明相互比照中,我们确实应该在传统的农耕文化中汲取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希望通过移植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解决欠发达国家地区的粮食问题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来许多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自然环境设计的;再则新技术的引进往往需要高额的投资,这对于资金缺乏而劳动力丰富的不发达国家来说,就等于是在用其稀少而珍贵的资源来取代廉价而丰富的资源。以印尼的爪哇为例,新技术的引入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一种灾难。“绿色革命”后这里许多地主买了拖拉机,其结果是使许多靠给人打零工的农夫工钱大大降低,甚至丢掉了饭碗。此外,用劳动效率指标(每个劳动者单位时间可以生产出的粮食所含卡路里的量)和能源效率指标(单位能源投入和产出的比率)衡量农业生产率,会发现现代化的农业科技是以高能源投入为代价的。在现代机械化的农场里,一个农

夫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粮食是前工业时代一个农民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单位土地面积上所能生产出的粮食也比前工业时代大大提高。但是,如果把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牲口、农具、农药、机械、灌溉等投入所含的能量都折合成卡路里,就会发现,在英、美等国家的现代化农场里投入一个卡路里的能量,只能收回 1.5 到 4 个卡路里的回报,而在前工业时代,这个比率高达 1:14 甚至 1:41。按此估算,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当今美国人那样消费动物蛋白质,而且这些动物蛋白质都是以美国的现代化方式生产出来,那么整个地球的石油储藏在短短的 11 年内就会被消耗殆尽。^⑦由此可见,现代化不仅给农业社会带来了环境和生态问题,还潜藏着更为严重的能源危机。

那么,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除了推动石油化学农业向生物工程农业转型之外,更为有效的路径之一就是开掘传统的文化资源,发挥乡土知识的生态调节功能。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体系都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大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只有精心呵护才是生存之本。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序列中,人位居林、水、田、粮之后,“有了森林才会有水,有了水才会有田地,有了田地才会有粮食,有了粮食才会有人的生命。”这样的“人”观和“物”观,使人们热爱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因此,无论是对山林的祭祀,还是农事节日的庆典,无论是传统的农耕技术,还是乡规民约,都是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资源。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稻作文化体系,是傣族社会经济的根基与支柱,千百年来长盛不衰。其独特的结构与功能在于:以适宜稻作农耕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稻作生计方式为核心,以相应的资源管理制度、农耕礼俗、精神信仰和优长互补的山坝民族关系为调试器,保证这一地区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平衡和谐。^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潜在的文化资源大多已被乡村文化惨淡的表象所淹没,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开掘”的原因所在。生活在黔东北的苗族,其文化传统具有“重巫尚鬼”的特征。这里曾以神鬼的力量来实现对森林的管护,而现在曾经肃穆、庄严的“神判”仪式很少有人参加,也没有人来执行以往种种强有力的配套措施。在他们的生活中,这种文化的约束力近乎降为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彻底消失。在其农民股份

制林业企业的森林管护制度中,我们仍能看到传统文化资源的变体形式。企业的形成与发展,依靠的还是头人、寨老、家族力量等文化资源,管理模式同样是“闹清”(用神鬼力量管理森林的一种方式)制度中强制力量的延续。^⑨可见,民族传统文化和乡土知识的开掘与应用,是决定当地生活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它对于森林保护和农业的永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家对前工业时代社会与人群的研究以及在少数民族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中的发现,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化背景下农业文化的保存与发展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三、留住技艺与记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2002年8月,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开始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Globally Important Ingeniou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其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使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这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对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策略。农业文化遗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保存至今的各种农业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后者则仅指开荒、育种、播种、病虫害防治、收割储藏等农耕生产经验以及与农业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的农具制作、农耕仪式的举办、农耕经验传承等农业生活知识。^⑩在农业社会里,这些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是在润物无声中进行的文化传递。

1. 农业生产经验的失落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处境
在专业化生产和全球市场的作用下,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化农业使传统农业受到威胁。新培育的高品种的推广,大多是以充分的水肥条件和防治病虫害的农药为前提。这种单纯追求高产的做法不仅使环境遭受污染、害虫天敌死亡、农产品的质量降低,也使我国许多优良的生态农业传统走向衰落。

从耕作技术和程序来看,傣族传统的稻米“寄秧”技术和“告纳”生产方式作为其独特的创造正在自然衰退^⑪。由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粤桂南部北热带地区曾广泛经营的稻田养鱼无法延续。珠江三角洲稻田和果蔬、水产轮作、混作、间套作的耕作制度消失,适合当地特殊条件的耕作方式“桑基鱼塘”

和“蔗基鱼塘”基本上被淘汰。热带、亚热带石灰岩园洼地干旱生态环境特有的双季玉米间套作黄豆、花生与饲养猪、牛的结合,也因改为水田而难寻踪迹。适应季节性缺水的许多水旱轮作、水肥轮作的耕作方式及其优良种植品种已消失。桐粮间作、枣粮间作、柿粮间作以及田地边缘木本或草本绿肥的种植也不再提倡。更有甚者,外来物种和高产品种的大量涌入,使本地物种的基因资源广泛流失,致使多样化的、低成本的生态农业产业结构被所谓现代化经营的农业生产结构所代替,从而构成了一种严酷的外来生物物种和生物文化的入侵局面。而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不仅为病虫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破坏了植物生长的自然选择,造成一些与之相关的物种在生物链中消失。这种人为破坏的结果,使自然界中的物种正在以十倍于物种自然消亡的速度消失^②。从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状况看,农业生产最直观的形式就是农耕技术和农具的使用。此时,那些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农业发展最高水平的传统农具,正在为抽水机、除草剂、收割机、打谷机等取代。作为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的历史记录,舂臼、桔槔、石磨等工具几近绝迹,无工业污染和能源消耗的风车、水车技术在化学和电力“工具”的冲击中备受冷落。农民与传统农具的疏离,与现代化生产工具的亲和,正宣告着乡村生活方式的变革。

农业生产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本。从生活角度来观察农业生产行为,可以称之为“农活”。在这一过程中,有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创造性劳作中对生活真谛的体悟。因此,农业劳动充满了一种“综合的人性”,其独特的教育作用有助于对“完整的人”的设计与培养。^③然而,现代化的魔力、经济利益的驱使正挑战着祖辈固守的农耕传统。那些没有经济价值或低产的品种被迅速淘汰,如何利用新技术脱贫致富、增加产量是从事生产的终极追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传统的农耕技术被摒弃,顺应动植物生长规律的农耕制度被现代化工具和技术改写。大棚技术决定了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和周期,嫁接技术让小果实植物长出硕果,激素饲料缩短了家禽、家畜的出栏时间。这种生产方式的革新,改变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人们对科技的笃信与虔诚,也使农事信仰对人的约束与规范日趋松弛。对于老一辈农民来说,祈求各种神灵护佑丰收的心理尚在,但在生产中也难以排除与一些禁忌相冲突

的施肥用药,他们正徘徊在神灵与现代科技之间。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传统耕作制度中所蕴涵的生态文化观已明显淡化,农耕经验在他们的头脑中几乎是空白,迫于生计外出打工使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丧失了与自然和农业接触的机会。他们不再是农业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这种情况不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所独有,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秋田县是日本主要的稻米产地,曾经以稻草为原料制作的生活用具(鸡窝、狗窝等)、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祭祀用品以及田间的稻草人,都曾是昔日乡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机械化之后,稻谷与稻草分离,稻草在田中被直接粉碎并埋在地下,成为来年耕种的肥料。那里的老人预言,稻草文化很快就会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与城市夺走了农业与农村的活力,也在不断重构着乡村的生活节奏与内容。

2 农业文化遗产与农民生活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为的是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的机械化相比,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经验有些已经落伍了,但它们所蕴含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巧用自然规律的发展理念却是我们一定要存留的。如果我们的子孙丧失了对这些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承能力,那么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疏离。就此而言,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表面上是保存农村文化,保留和城市文化相对应的另一半文明,更为长远的意义则在于存留现在的生活状态与过往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这是农耕民族生存与发展之根。

然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农民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是存在矛盾的。在云南省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业的丰厚收入使傣族稻作农业的传统地位下降。这里种一亩水稻纯收入 288.95元,而种一亩橡胶纯收入 500元且可以连续受益几十年。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曼远村的个别农民已开始将祖辈传下来的薪炭林(黑心树)砍掉种植橡胶,给全村的燃料短缺埋下隐患。^④类似的情况即使在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也同样存在。2005年5月16日,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的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被评为首批世界重要文化遗产之一。这里的稻田养鱼已有 1200多年的历史,其耕作和养殖方式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具有现代农业不可比拟的优点:第一,稻草为鱼类提供肥料,而鱼类为水稻提供肥料;第

二,土壤越用越肥,不存在土壤板结和地力下降现象;第三,农产品几乎没有污染,绿色天然,味美价高。^⑤这种内在的平衡机制维护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当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受到了制约。为节省人力和物力,青田县很多乡镇的稻田养鱼已由原来的泥制田埂变成了水泥田埂。由于采用投放饲料的方式喂养,田鱼的产量大增。这种生产方式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理念是相背离的。此外,由于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不断增加,当地掌握农业遗产技术而又专心投入这项劳作模式的人正在迅速减少,这无疑给农业技术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同于实验室和博物馆式的陈设,其重要的属性是在农民的生产 and 生活中进行“活态”的传承。因此,怎样使农民留在乡村经营传统的农业,又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便是寻求出路的核心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文化遗产保护并非守旧,并非让农民的生活凝固不变。农民也知道青山绿水好,但当他们还在生存线上四处张望的时候,让他们信守生态原则、提升环保意识只能是苍白无力的说教。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在开发与保护这对矛盾中,学者们寻找到了弥合二者的有效路径——生态旅游和传统手工业的振兴,他们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可行性模式。^⑩在发展旅游产业这一视角之下,我们看到了传统农业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契机。广西省龙胜县利用山区的自然环境、历史悠久的稻作生产以及传统的手工业技术,开发了以观光农业为龙头的旅游产业,使龙脊梯田、壮锦、苗族刺绣这些传统的文化遗产转换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在拥有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标签后,从上海、杭州等地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其独特的田鱼文化、民俗文化、华侨文化有效地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旅游业年收入达 200 万元。在经济上直接受益的农民也由此切实感到继续保持稻田养鱼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必要性。目前方山乡稻田养鱼的面积扩大到 5000 多亩,部分年轻人也因此留在村中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正进入良性循环之中。诸如此类的情况,在我们对京郊村落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京西妙峰山下的涧沟村凭借明清以来的庙会文化传统和玫瑰花的采摘发展乡村旅游,樱桃沟村则以樱桃

的采摘使旅游成为地方的支柱性产业。这些成功的案例使我们看到旅游开发与农业文化的双向重构过程,一方面乡村旅游依赖农业文化的品牌,另一方面农业文化也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手工榨糖、酿酒、纺棉织布、土陶制作、打铁、竹编等一些古老的技艺以及收藏在博物馆里的农具,这些曾经是乡村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元素,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无名工匠的创造冲动,也记录了农耕民族文化创造的历史。那些源自于乡土的民间艺术同样是民间艺人对其生活世界的审美传达。因此,只有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我们才能理解江南水乡的跳鱼舞、西北干旱地区的唱雨戏,我们才能在独特的韵律中体会到农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丰收的期盼。此时,面对转型中的乡村生活,留住那些与农业生产和生活一脉相承的历史记忆,这是使农村充满生机活力的前提,前者是后者之根,根壮方能枝繁叶茂。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所谓的新农村建设,究其本质应是重新建构一种理想状态的农业文化。因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决定中国社会形貌的因素依然是农村、农民和活在学习生活中的乡土文化。

注释

- ①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33页。② 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76—180页。③④ 陆学艺:《统筹城乡发展,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经济学家》2008年第2期。⑤ 叶敬忠等 2008年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静赏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中描述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⑥ 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⑦ 周蔚、徐克谦:《人类文化启示录》,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55—260页。⑧⑩⑪⑫ 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稻作文化的传统实践与持续发展》,《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35、525—527、537页。⑨ 邢启顺、麻勇斌:《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约束力在森林管理中的嬗变》,《乡土知识的实践与发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54—163页。⑩ 苑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所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006年第6期。⑫⑬ 王献溥、于顺利等:《从传统农业的衰落谈农业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8期。⑭ [日] 祖田修:《农学原论》,张玉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0—155页。⑮ 参见阎庆文、孙业红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与开发》,《经济地理》2007年第5期;袁俊、吴殿廷等:《生态旅游: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开发的制衡》,《乡镇经济》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海玉